

清代江西的家族、乡绅与义仓*

——新城县广仁庄研究

袁海燕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 广仁庄为新城县中田镇的两大家族倡导建立的乡族义仓。它不仅是社区性的救灾机构和粮食储备系统,而且广泛资助各种慈善事业、公共事务,对社区生活实行了全面的干预,成为社区权力中心。乡绅们通过控制广仁庄而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但仍离不开官府的监督。通过对广仁庄的研究,可以看出政府对地方的管理由垂直控制转向地方协调。

[关键词] 清代;新城县;家族;乡绅;义仓;广仁庄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2X(2002)-04-0040-09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区域社会经济史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热点,对义仓的区域性考察也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然而,就明清义仓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而言,尚未尽如人意。以往的研究虽也探讨了义仓与乡绅、家族的关系问题,但对于义仓与乡绅及地域社会的变迁关系尚少有论述。^①就清代而言,乡绅往往通过建设义仓以达到社区整合的目的,建构对于地方社会支配权,从而集中地反映了地方权力体系及基层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演变。本文拟通过对清代江西新城县义仓的个案研究,探讨乡绅、家族在地域社会中的地位及其社会控制权的建构过程。

一、新城县中田镇的望族与乡绅

新城县(即今江西省黎川县)位于江西省东南尽境,毗邻福建省,在历代行政管理上属于边缘地带。武夷山脉巍然立于县境之东部、东北部及南部,渐次向中部及西北部倾斜。境内峰峦起伏,山地广阔,只有中部及西北部地势平缓,沿河分布着大面积农田。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始析南城县东南五乡,设新城县,因为黎滩河贯穿全境,故别称黎川,先后隶属于建昌军、建昌路,至明清时期属建昌府辖。民国三年(1914年),因当时全国有四个新城县,为避免重名,故改江西新城县为黎川县。

清康熙时,中田镇为新城县十大市镇之一,位于新城县西北部,与江西南丰县相邻。据说,当地因周围数小村落环绕,居中为田,故名“中田”。^②在行政建制上,明清时期中田属新城县十九都,其名称曾几度发生变更。明代称为“中溪”^③,至清初逐渐发展为镇市,随之称为“中溪镇”(钟溪镇),又称“钟田镇”^④。乾隆以后,中田科举盛极一时,考中进士的人数居全县首位,因此人们又誉称之为“钟贤镇”。

关于清代中田镇的地理概貌、人口及生态环境,清人鲁山木作过如下描述:“中田,新城之西乡下十九都也。其山曰^{木樓}栖灵峰,独耸西方,……水自福建诸隘而来,至樟村、宏村渐大,可通舟楫,逶迤而流,绕中田出双港口,是为邑之西川,至双港口与中川会,又二十里抵落硝石,与东川会而入盱。”

* [收稿日期] 2002-05-08

河东有山……山下皆平田。居民错处两岩间。虽村落不一，然纵横五六里，衡宇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连属罗络，可约而稽也。……中田之户，一千四百有奇。其为士者二十之一、为商贾者亦二十之一、为农者十之三、农而兼工者十之二、其专为工而游艺于闽越吴楚者亦十之一焉，其余则所谓间民转移执事者也。”^⑤ 如上所述，中田镇的水路交通较为发达，为抚河水系之一，并可直达鄱阳湖而入长江，这是其成为市镇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代中期，中田镇的主要居民为鲁氏和陈氏二大家族。鲁氏是定居中田历史最早的居民之一，据鲁氏族人鲁九皋记载：“（中田鲁氏）自宋循吏有开之子孙，由江南亳州迁居江西之南丰，其后有曰佐文者，复由南丰迁居新城之中田里。于是新城之中田有鲁氏。鲁氏之处中田，世读书，敦礼让，洎日月之中晚，历时既久，族渐繁，士遂多，有声庠序，间其出而仕者，忠义之节，德业之著，皆卓然有以自立。入国朝而益显，科第仕宦属。”^⑥ 鲁氏自北宋中期迁居中田，历经数百年的发展，至明清已成为当地世家望族。从史料记载看，世人在谈到中田时，多提及鲁氏，如“中田鲁氏，号称富盛，礼让自将，颇为美俗”^⑦；“中溪鲁氏，文学尤著”^⑧；“十九都峰峦耸秀，中有石坛，多灵迹焉。中溪后名钟贤，鲁姓文学尤著。”^⑨

明末以前，鲁氏以“富盛”闻名乡里，而科举功名少有突出表现。自明天启元年，其族人鲁论以选贡入仕，到清代，鲁氏在科举上地位日益显要，并渐居于新城县首位。终清一代，中田鲁氏一门共出 17 名进士，占整个新城县清代进士总数的 1/5，举人 34 位。其中以康乾时期为极盛，共出 12 名进士。如表一所示：

表一 清代中田鲁、陈氏科举表

姓氏	进士数	占新城县进士比例	举人数	占新城县举人比例
鲁氏	17	20%	34	14.2%
陈氏	7	8.2%	14	5.8%
合计	24	28.2%	48	20%

资料来源：同治《新城县志》卷八·选举志

由于科举功名鼎盛，鲁氏逐渐成为新城县的著姓、地方上的望族。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新城县乡贤祠中开始列祀鲁氏人物。在乡贤祠中共列祀有三十五人，其中鲁氏占据了五位，可见鲁氏在新城县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⑩ 吴宗慈在《民国江西通志稿·氏族略》中记载新城县著姓共 21 族，并将中田鲁氏排在第二位。^⑪

科举的兴盛强化了宗族的力量。明清之际，鲁氏通过建祠堂、立族田、编辑族谱等，建立了严密的宗族体制。康乾时期，鲁氏族人共同商订修祖祠、立祭产，“以仲正公为始祖，既创立家庙，修祀事”，并开始第四次大修谱牒。^⑫ 与此同时，鲁氏也积极参与地方公益事业，在灾荒年份大力赈济救荒。如康熙丁丑（1697 年）、甲申（1704 年），先后岁饥，义士鲁时贵“出谷数百石发赈”，鲁时凤“煮粥救饥，以待四方来者”，鲁时凰也“出谷赈饥”。^⑬ 乾隆甲辰（1784 年），岁荒，鲁廷才买谷千余石，碾米减价平糶。此外，中田镇著名的鲁公泉亭、长庆亭、拱北图南亭及永济桥等，皆为鲁姓人所捐建。^⑭ 鲁氏族人致力于上述社区福利事业，不仅增强了宗族的向心力，而且也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力，奠定了鲁氏精英在中田的领导地位，逐渐建立起地方权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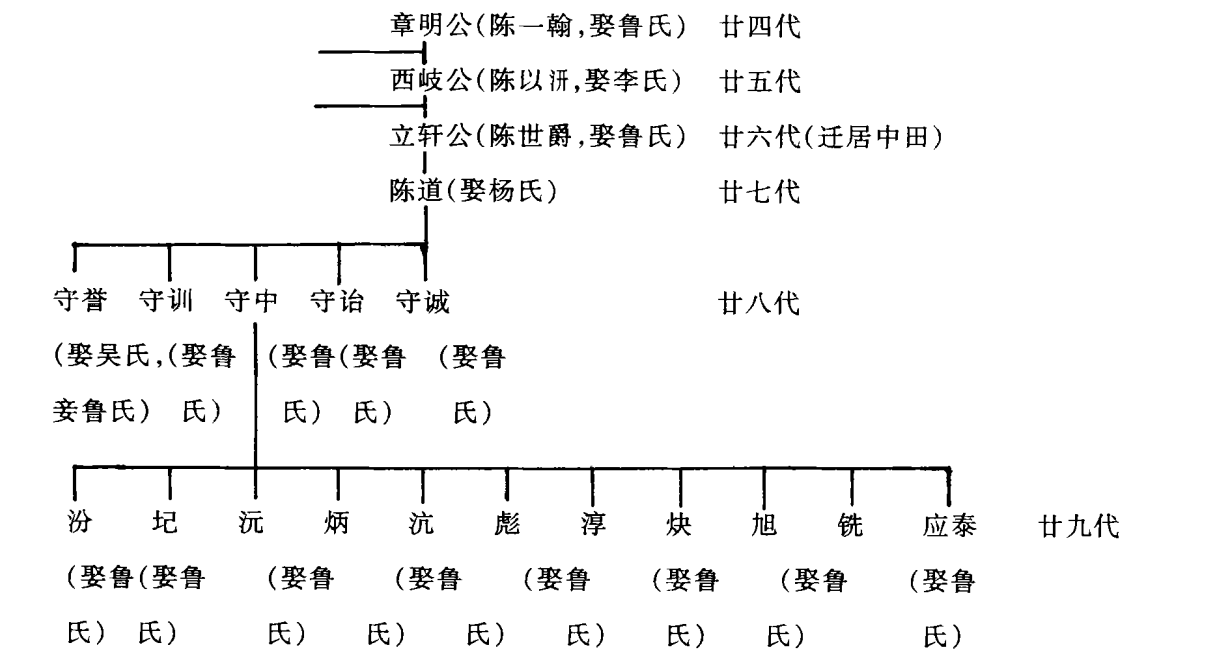
在中田镇，与鲁氏并驾齐驱的另一大族为陈氏家族。陈氏大约在清顺、康年间始迁居中田。据新城人涂南池记述，陈氏“先代自宋进士孔明，籍江西之新城，居县治”^⑮。至清代，陈姓仍为县城东坊四大姓之一。明末清初，陈氏从陈以升^⑯ 一代家道中落，于是“析诸子异居”，其中陈世爵（1682—1752，字浣修，号立轩）一支移居于“西乡钟贤里”，即中田。陈世爵迁居中田，主要是因为其妻为中田鲁姓，凭姻亲关系得以在中田立足。到中田后，他弃儒经商，主要在南昌经营木排业。由于新城位于山区，木竹业较为发达，加上龙安河从中田穿过，可直达抚河，再到鄱阳湖而入长江，地理位置利于发展木排业。世爵励精图治，经过苦心经营，逐渐成为巨商富贾，甚至在省城南昌也有较大影

响。^①陈世爵独子陈道事举业，于乾隆十三年（1748 年）中进士，但并没有出外任官，而是乡居于中田，从事家乡建设。陈氏家族在乡居进士陈道的经营下，家道日盛，大批子弟获取功名，“乾嘉道年间，一门七进士、九乡榜，为邑之冠，称望族”。^②陈氏族中多人曾官居高位，显赫一时。

陈道在中田镇大力营建陈氏宗族体系。他将“和三族”写入家训，声称：“吾族散居远隔，情涣而气不聚。人之情习多孤傲不相下，生齿不繁，大都由此。向于祖父祭田内立助赠规条，冀欲聚涣收族，培养元气耳。”^③雍正十三年（1735 年），陈氏族人商议整修祖祠。此后陈道及其子在地方上立庙、做慈善事业（修桥铺路等），并先后在府城捐建盱江书院、新城县捐建黎川书院、南昌捐修豫章沟、京城修建新城会馆等。陈氏家族的势力也随之扩大至新城县、府城南城县及南昌府。^④

鲁陈两个家族，同在一个社区，并为大族，彼此又通过婚姻加强联系，双方共同建立起地域婚姻圈。如陈道曾经写道：“陈鲁于中田为著姓，陈氏之兴后，鲁氏而世为婚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陈氏家族的婚姻看出。请参见表二。

表二 陈氏世系表



如上表所示，陈氏迁居中田的第三代，即陈道之子皆与鲁氏结为姻亲。而此后乡居中田的陈守中一支，其子也多以鲁氏为妻。鲁陈二姓通过姻戚网，形成了稳定的家族联盟，共同治理地方社会。

二、从家族义仓到乡族义仓

雍乾年间，随着国家荒政的衰败，常平仓、社仓日渐衰微，清王朝多次诏令民间参与地方仓储制度的建设。另外，清乾隆帝在南巡苏州时，亲自去范氏义庄，察看范仲淹祠堂，并赐其园曰“高义”，亲书匾额，且赏赐范氏后裔以貂币。皇帝的这一行为大大刺激了家族建设义仓的热情。在政府的大力提倡下，江西各地积极响应，强宗大族纷纷兴建义仓。

中田镇的鲁、陈两大家族，于乾隆年间先后创建了家族义仓。陈氏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始建陈氏义仓，仓谷来源于陈氏祭田。陈道在其父陈世爵去世后，置田二千石，“为公祭田，于中供祭祀而外，即推其余以助族人之贫乏者”。^⑤陈道去世后，长子陈守诚又置祭田二千石，由嫡支子孙经理。不久陈守诚去世，其长子认为祭田有定数，每岁自供祀事而外，所余之数不能增长。于是，决定将此祭田推为陈氏家族的义田，并建一仓，按照范氏义仓之法，以助赈族人。陈氏义仓共藏谷二

千石,为此在家庙之前建立了规模颇巨的仓库。县志对中田陈氏义仓有如下详细记载:

家庙之前创立广廐,翼以两厢。凡为仓十有四,缭以周垣,其前为治事之堂,堂东西序为夹室,堂之前有庭,庭左右为两庑,庭前为门,门有厅事六,东西皆有塾,而堂室门塾皆特建巍楼,足以凭高而望远也。门之外更设外垣,其中纵横十八丈,为曝晾园场。^②

陈氏义仓建好后,第三年,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鲁氏也开始建设鲁氏家庙义仓。据县志记载:

鲁姓子孙各户量力捐输,得谷七百石有奇。春散秋敛,每石取息一斗三升,扩大日积,遇荒歉则平糶,合里各姓以为常,不仅为鲁姓义仓已也。故里中各姓匾鲁氏庙门曰‘乡间食德’。^③

鲁氏义仓规模虽不大,但因将受益范围扩及中田其他居民,因此也获得了里中更大范围的认同。相比之下,陈氏的家族义仓较鲁氏家庙义仓规模更大、藏谷数量也多,但只限于家族内部,所以在地方上的影响仍逊于鲁氏。因此,鲁、陈二姓经过协商,决定在中田镇共同建立“广仁庄”义仓。广仁庄不为任何一姓所独捐,而为全中田居民所共有,因而成为以家族联盟为基础的、社区性的乡族义仓。

广仁庄的建立,最初与陈氏家族直接相关。中田镇因地势较低,新城县三大河之一的龙安河穿过中田,一方面带来了便利的水上交通,但同时也使这里成为水灾爆发极为频繁地带。乾隆八年(1743年),江西省多数地方发生水灾,“全省春夏淫雨害稼,岁大歉,”全省十三府中有十府出现大饥,“南昌、饶州、建昌、广信、抚州、瑞州、袁州、吉安、赣州府大饥。安福、泰和、吉安、新干、玉山、安仁、进贤、南昌等县有食土者,食而死者甚多。”^④这一年,江西、湖南、福建、浙江都发生了抢米事件^⑤。陈世爵在南昌得知中田镇受灾后,当即在南昌买谷四千余石救济乡人,其子陈道则在家乡以编户计口方法救饥,即按“丁口写清门户牌,每家每日需米若干,注于牌”,以市价三分之一进行平糶。^⑥从此次救荒平糶后,陈氏即于家中藏谷三千石,平时“视年岁之丰耗、里谷之多寡,时价之低昂,俟糶倏止,与时消息,岁饥则仍发而平糶”,如此达三十余年。^⑦陈氏此时虽未建仓,但其所存谷已起到义仓的作用。

乾隆四十年(1775年)时,陈道及长子陈守诚已相继去世,陈氏家族以陈道次子陈守诒主持事务。陈守诒(1731—1808)字仲牧,号约堂,援例员外郎,补官师擢车驾司郎中,后官安徽太平知府、河南陈州知府。这一年,他决定在家族义仓之外,将前所述三千石救荒谷“推而公诸里中”,“使里中无告之民有所依,里中公事亦有所取资”。^⑧他准备再建一仓,但考虑到鲁氏势力,还是决定与鲁氏商量。

陈守诒与鲁氏族人鲁九皋商订共建义仓。鲁九皋(1732—1794)原名仕骥,字洁非,号乐庐,又称山木先生,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进士、山西夏县知县。在出仕之前,居乡里达十余年之久,多做善事,屡次倡议设族田、建义仓;且善医术,多次为乡人看病施药,曾在流行性传染病中救人甚多。因此,鲁九皋在族内及乡里威望极高,乡族有疑义纷争多由他出面调理。他与陈氏家族关系密切,不仅为陈氏姻亲,且为陈道门生,以后又为陈氏子弟执教,其弟子陈用光、陈希曾、陈希祖先后中进士。^⑨鲁九皋对陈氏所举极为赞同,同时又出面劝捐里中各姓,输资为建仓费。在他的倡导下,“乡人相率捐谷,易金千余两”,于是共建一仓,并名之为“广仁庄”。陈氏家族在所捐三千石谷外,陈道后代各人又共捐谷达千余石,“陈守诚长子光禄寺卿元偕其叔守诒、守中、守誉共捐租四百石,正岁收其谷以护仓”。陈道另一子陈守训因在山东任官,得知此事后,也捐谷一千石同储仓内。^⑩广仁庄建好后,陈氏家族在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持下,为进一步扩大其在新城的影响,趁势在各乡与当地巨族大姓合建乡族义仓多达十余所,所捐谷数也几近万石。详见表三。

陈氏家族作为县城大族移居中田,起初虽人丁较少,根基薄弱,但随着经济及政治地位的上升,急切要求分享地方权力。为得到中田人的认可,借着政府大力提倡建设义仓之举,不惜巨资在当地捐建义仓。鉴于鲁氏在当地根深蒂固,势力强大,于是两者再合建乡族义仓。鲁氏因在经济实力上

表三 新城中田镇鲁陈家族捐建义仓一览表

仓 名	建立时间	主要捐建人	捐谷数	位 置
鲁氏家庙义仓	乾隆三十九年	鲁氏	七百石	中田
广仁庄	乾隆四十年	陈氏	四千多石	中田
陈氏义仓	乾隆三十七年	陈氏	二千石	中田
永丰仓	嘉庆二十年	中田众姓		中田
丰裕仓	乾隆四十年	陈守诒	五百石	十二都卓望峰
永济仓	乾隆四十年	陈守诒	二百石	十五都
妙济仓	乾隆四十年	陈守诒	一百石	十五都
大济仓	乾隆四十二年	陈守诒		十五都
永惠仓	乾隆四十年	陈守诒	二百石	十六都曾坊
同仁仓	乾隆四十年	陈守诒	四百石	十六都篁岭
绥和仓	乾隆四十年	陈守诒	四百石	十七都公村营
十八都义仓	乾隆四十年	陈守诒	一千石	十八都
永裕仓	乾隆四十年	陈守诒	一千石	十九都焦原
裕原仓	乾隆四十年	陈守诒	一百五十石	十九都澄潭
益原仓	乾隆四十年	陈守诒	二百石	十九都益原
义积仓	乾隆四十一年	陈守诒	二百石	桃溪浒市街

资料来源：同治《新城县志》卷三·仓储

稍弱，也同意陈氏之举。陈氏凭借经济上的优势，另与周边各大族联合建设乡族义仓。因规模颇大，所以不仅在中田人所共知，且声名远扬，如赣州府钟氏家族也受其影响，在家乡建立义仓。时人王泉之记曰：“虔州鹭溪钟敬亭太守承懿命，仿姑苏范氏、当湖陆氏、新城陈氏，置义田万亩，作贍族之举。并建义仓一所，贮谷千石作荒年平价、减赧之需。”^③由此可见，乡绅阶层积极倡导创建乡族义仓，已成为清中叶江西颇为盛行的社会时尚。

三、义仓与社区权力体系

在清代中田镇的社区生活中，广仁庄的建立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一方面，广仁庄作为社区性的乡族义仓，在灾荒之年对当地的救济与平赧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广仁庄作为乡族组织的共有经济，也成为当地乡绅举办地方公益事业的主要资金来源。因此，广仁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义仓，而是乡绅们进行社区管理的机构及社区权力中心。

为了有效管理广仁庄的有关事务，中田镇的乡绅们制定了一整套相应制度。首先，建祠以祭祀乡贤，建构乡绅阶层的文化霸权。在广仁庄建成后，乡人认为广仁庄关系到一方之民食，应该有神以主之，于是公议祀乡先贤邓潜谷（元锡）及陈凝斋（道）两先生。邓元锡（1527—1592），字汝极，号潜谷，新城县城南津人（《明史·列传》记为南城人），明嘉靖间举人，为知名理学家，与吴与弼、刘元卿、章潢号称“江右四君子”。邓元锡十七岁时，即在家乡施行社仓法，惠其乡人，储粮备荒，赈灾扶困，因而深受邻里爱戴。此外，广仁仓的建立主要依赖于陈氏的捐建，推其功则在陈道，加上陈道为乡居进士，在家乡先后多次主持公益事业，所以在中田地位颇高，又为新城县知名理学家，同时也是鲁氏代表人物鲁九皋的老师，所以祭祀陈道也为乡人所公认。乡绅规定祭祀仪式每年举行一次：“每岁春月将欲开仓碾米、出赧及岁终总会出入成数。总理卜期设祭。请合里绅耆会祭，祭毕饮饯。即以酌议应行之事”。^④

其次，由乡绅全面负责广仁庄的经营管理。由于广仁庄藏谷数量较大，加上秋冬收租、岁时出纳，事绪繁杂，所以必须推举里中公正而肯实力任事之人总理其事。广仁庄创建之初，乡人推举鲁九皋为主管。至于陈氏所捐的十余处义仓，“其创建规模，经理格式，陈君皆委任仕骥为之调度”^⑤。

鲁九皋制定的《广仁庄条规》^③，对管理人的任用、管理费用的支取、平糶的具体事务等都有极为详细的规定。如云：

其出户收租，按甲轮金递管，亦必公正而能任事之人。至收租酬劳之费，每实收谷一石内抽二升与之。而谷必须颗粒交总理晒_日归仓。倘有受佃户贿赂，私减额租者，查出倍罚以广仓费。其晒谷入仓，总理另雇小工，总理每岁归俸叁十石，如有廉介不受者，于册内注明某人某年不受俸，即捐入仓以广畜积；

庄既积谷数千，看守不可无人，而仓储重地，不可间杂人居住。今于垣墙外筑更房一间，募人巡守，每岁给谷二石酬之。

对于广仁庄中积谷的经营方式，乡绅也作了详细的规定。广仁庄建成之初，是承陈世爵、陈道之志作为平糶之用，“庄内积谷，原以备里中平糶之用。非可以社仓春借秋还之行法也”。一方面采取传统的储谷入仓，在青黄不接时期实行借贷。另一方面，又因南方气候潮湿使粮谷易腐蚀霉变，所以“推陈出新必有其方，大抵二三年必须一易”。并规定在条件允可的情况下，可以将庄中所存谷作为商品出售，卖掉一部分，并于秋收后购补填仓。如云：

假而积之既久，年岁实系丰登。里中之谷既有余，而邻境谷价稍昂，虽搬运，里中不受其病，则于夏至前后，量卖与贩户，至一半而止，其半仍备荒口，或至陡贵得以接济。不可尽卖出也。然虽仅一半，而秋收后，即须补填仓。若岁小歉，市中米价稍高，即宜照时价卖米，价一平而谷出稍多，即止勿卖。总之，与时消息，使米价不至太高，贫民有所得食而已。平糶之法，非万不得已，不可漫行。必市中米价日长，每升至钱十五文以上，势犹不止，然后按里中编户，实在贫穷须余米者，照依门牌填给米票，每人每日给余半升，其价每升以钱十四文为准，不可太减，太减则逐利者从而生心，弊端益滋矣。……扣算所折若干，即须设法或多方劝捐以足原额，或于本年收租谷内有可省之费则省之归仓。或有别项出息，可以填仓，总期无亏原额。

另外，平糶所得资金，则采取存典生息的方法，以期资产增值：

凡平糶每日出米若干，得钱若干，开销若干，逐日结帐，即将所得之钱，逐日寄当或稳实铺户生息。事竣，经众结总帐，实得钱若干，生息若干，出新即须买谷填仓，不得延捱。

再次，广仁庄还全面资助中田镇的各种慈善事业及地方公共事务，为士绅控制地方社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如在照顾鳏寡孤独、废疾及穷人上，规定如下：

拟岁终，于收租谷内，每人量给钱米稍周恤之。他年有好行德之君子，益扩此田，则谷亦当随增。其鳏者独者，必年六十以上；孤子则年十五岁以下乃给；寡妇、废疾则无论其年齿概给之。凡居斯土及游食之人，有身死而不能具棺者，给棺木钱二百文；葬埋之费二百文。责令乡保监视，深埋于义冢，无令野兽发掘，其钱均于租谷内支销。

对地方事务如禁私宰、管理山林、实施保甲法等，也有具体规定：

拟设一埋牛之冢，凡有倒毙之牛，劝令扛抬至冢深埋。果系贫家，量给牛价，其小牛百斤内外者，给钱八百文；中牛二百斤内外者，给钱一千六百文；大牛三百斤内外者，给钱二千四百文；若水牛至四五百斤者，给钱三千文。既领此钱，即责令自挖深坑，固埋实筑，庶厉废之气，不至薰蒸，而人不受害矣。其牛价亦于租谷内支销。

《广仁庄条规》对中田镇的主山_棲灵山的_棲管理也有严格限制：

往时前辈莫不加意栽插松苗，时为培植。然里中烟户既众，戕害者多。常见其濯濯焉。自观察恕堂陈公（陈守诚）暨其弟绎堂比部（陈守训）采访舆论，岁时加禁。且召募里中壮_丁司稽巡，月给既票。而约堂选君（陈守诒）为置租田二十余亩，俾自收其租谷之入。然人众而谷入无几，又多耗费，反启争端。今仍以此田归入广仁庄内，总理_日为收租完粮，其看山之人，每年每人于岁终至庄领谷一石，其不实力巡山者勿给。

此外,《广仁庄条规》也反映出乡绅对地方基层组织保甲的介入,利用官方推行的基层行政制度支配地方权力体系。如条规中规定:

里中烟户千有数百,官既给十家牌令互相稽察。然生息日殷,而往来迁徙者日众,岁有更易。每岁首,合里宜自造清册,送官换给门牌,其纸笔之费,亦于租谷内支销。

综上所述,广仁庄对社区生活实行了全面的干预,俨然成为社区权力体系的核心和士绅阶层控制地方社会的有效工具。正因为如此,广仁庄管理权也就成为清代中田镇的主要权力资源,因而必然导致当地士绅和不同家族之间的竞争与冲突。

四、围绕广仁庄的权力之争

广仁庄与陈氏所倡建的十余处义仓,最初都是由鲁九皋订立条规并主持管理的。由于鲁九皋在地方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及威望,因此各家相安无事,如陈守诒曾说:“先生(鲁九皋)时方家居,教授总其成者十五年,时其赢虚而损益之,法良意美,乡之人称颂不绝也”。^③然而,在鲁九皋出任山西夏县知县后不久,中田镇的乡绅及大族间对义仓的管理权也开始发生了矛盾冲突。

乾隆庚戌岁(1790年),鲁九皋行将赴铨于朝,于是将各处义仓簿籍归于陈氏。在当时,陈氏族人“念乡人之无可责成也,乃归其簿籍于余家司事者,令按成法而行之”^④。由于此时陈氏家族中有威望及功名者多在外任官,如陈守诒正任河南陈州知府,“诸子长者求仕京师,幼者随官南方”,因此,陈氏所选拔任广仁庄的管理者,其能力及声望皆不足以服众,“其材既不足以相及,其力又不足以相敌”。而且广仁庄是属于全中田各姓所有的,为中田镇的乡族义仓,非陈氏所专有,而鲁九皋在将广仁庄的管理权移交给陈氏时并没有得到全乡的公认。所以自鲁九皋后,广仁庄的经营管理始终存在着合法性危机。

嘉庆七年(1802年),中田陈氏最终因义仓的管理权问题而被讼之于官。据陈氏族人记述:“乡人之桀黠狡诈者,思夺余家司事之人,而后得恣其吞噬也,遂以侵蚀诬之官。”^⑤对这场争论,因史料皆来自于陈氏人的文集,所以自然有所偏颇,无法了解其真正的、具体的原因。但陈守诒之子、嘉庆六年中进士的陈用光曾记道:“乡人之讼者,其说虽不为无据,而其意则亦在于攘其利。”^⑥其中陈氏所提到的“乡人”,很有可能即指鲁氏家族成员。陈用光在给侄子陈兰祥的信中提到这一事件,并对鲁氏所为颇有微词。(详见下文)由此,陈氏被迫开始了长期的讼争,“迄三岁,讼不休。中更数手而耗折日盛”。^⑦至嘉庆十年(1805年)五月,在太史赖铭斋在裁决下,官司终于有了结果,“知建仓循朱子法,使乡人捐谷者同稽其出纳之意,乃断专归陈氏,既逐主计者”。^⑧

此后,陈守诒命其长子陈煦(乾隆五十一年举人,曾为光禄寺署正)主持广仁仓的经营管理,并希望通过与乡人共同核查,使自己“往者惠济之心尽白于乡人”。为防止弊端的发生,陈氏对各仓进行了清理,最终陈氏原捐十四处义仓或废或并,剩下九仓。陈煦一改以往各仓集中经营的做法,将各仓簿册分开,每仓各自为一簿,而以一册总汇之。总簿二册,一册置于陈氏家族、一册存于仓,以便与乡人公察。此外,陈氏又将鲁九皋的记文及官府官印列于簿本之前,以作为“尚方宝剑”,“呈官以簿,乞与一印,今后之桀黠者,犹敬于官而知畏也”。^⑨

不过,陈氏在这场官司中并没有完全取得胜利。首讼者虽受到惩罚,但官府也要求将广仁庄中乡人所捐谷分还众人,而仓则专归陈氏。以前因广仁庄为乡族义仓,所以鲁九皋规定由陈氏与乡人互相稽考。现出现争诉,所以官府判决乡人将所捐谷分出,由陈氏专管自己所捐谷仓。按上述判决,乡人将谷分出,则原来广仁庄中众人所捐谷,除去建庄花费外,所存谷石,众人将其取出。此后又在嘉庆二十年(1815年),在鲁氏组织下,众人将取出的谷,另外建一义仓,取名为“广义仓”。几年后,中田各姓(陈氏除外)再复加捐,并输资建仓,“同社仓以行”,将广义仓改名为“永丰仓”。^⑩永丰仓建于钟贤社仓旁边,主要归鲁氏族人主持。

陈氏当然对鲁氏组织中田镇人再建一仓一事极为不满,陈用光认为“广仁庄事已平矣。而鲁氏乃为众姓建庄。在彼虽出于私意,而其名则公。吾家无私意,而所为则近于私”。^⑬这场官司虽惩“首诉者”,但从此后鲁氏夺取了以前由陈氏控制的在中田的各姓所捐义仓,且陈氏家族当初是因广建义仓一事而声名远扬,并因此在中田镇也享有声誉。广仁庄一案后,使陈氏不仅失去了对广仁庄这一权力机构的控制权,且在中田名誉扫地。鲁氏则趁此机会夺取了对中田义仓的控制权。难怪陈用光深深感叹道:“以彼(鲁氏)之公,绌我之私,吾陈氏此后无以服众矣”。^⑭陈用光认为:“欲清葛藤,惟合而后能断,分则必不能断。或因他事生波澜。彼来则我亦不能不应,不能听其自颠自倒也。”用光同时也告诫侄子陈兰祥(伯芝)要处理好两大家族的关系:“伯芝之才可以明了于事,而今乃不明于事。伯芝之意极尊宋儒,而其识见全非宋儒。吾欲伯芝之明于事,乃蹈成事,不说之咎,而复与伯芝言之,伯芝当能知此意也。”^⑮

鲁陈家族联合建立起乡族义仓,并且通过义仓建立起社区权力体系,初步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支配权。但二者之间因家族的利益关系,仍不可避免发生矛盾。此时要解决这一争端,仅靠社区内部的力量是不够的,仍然必须通过官府。当然,官府对此案的裁决是十分谨慎的,既要考虑到双方的政治地位,又必须考虑到双方的社会实力。陈氏家族此时出外任官者居多,且官位居高。如陈希祖(1767—1820)初为刑部主事,改任吏部郎中,后补任浙江道监察御史;陈希曾(1770—1820)由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刑部右侍郎等职;陈用光在嘉庆六年(1801年)中进士后,改庶吉士,授编修;陈守训为江苏按察史;陈煦为光禄寺署正。鲁氏家族中当然也有不少出任为官,但多为地方级官员,相对中田陈氏来说,显得稍弱。不过,鲁氏为中田镇土著,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人丁繁盛,在地方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历任地方官员在处理此案时,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千方百计维持地方政治权力体系与各方利益的相对平衡。

结 语

清代的江西新城县中田镇,虽在行政地理上属于国家统治的边缘地带,但当地士绅在正统的儒学意识形态指导下,积极参与各种地方公共事务,对地方社会实现了有效的控制。鲁、陈二氏作为当地的两大家族,通过世代联姻及学术师承传统,形成了士绅阶层与家族之间的政治联盟,共同维护基层社会的统治秩序。因此,从创建家族义仓到创建乡族义仓的历史过程,反映了基层社会结构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深刻变化。

在乡绅阶层的倡导和支配下,中田镇的广仁庄不仅是社区性的救灾机构和粮食储备系统,而且广泛资助各种慈善事业与公共事务,对社区生活实行了全面的干预,因而可以视为社区权力中心。不过,也许不能因此得出乡绅完全控制了地方社会的结论。当社区内部因争夺对广仁庄的管理权而出现矛盾时,仍需要官府出面以解决争端。所以我们不妨说,此时,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理由垂直控制转向地方协调。“在18世纪的中国,儒家关于维持地方秩序的策略,并未给精英或官员以地方秩序惟一监护人的特殊地位,而是根据不同的地方的情况,承认二者都是监护人。”^⑯当然,乡绅在地方事务中扮演着较为主动的角色,但官方的监督仍不可缺少,二者基本上相互依赖,保持较为和谐的局面。

注释:

- ①如冯尔康《论清代苏南义庄的性质和族田的关系》,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3期、山名弘史《清末江南义庄について》,载《东洋学报》第62卷1、2期、张研《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春声《论清末广东义仓的兴起》,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王日根《明清福建与江南义田的比较》,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1期、范金民《清代苏州义田的发展》,载《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余新忠《清中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苏州丰豫义庄研究》,载《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

- 义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4 月等等。
- ②江西省地名办公室编印，《黎川县地名志》，1987 年，P34。
- ③正德《新城县志》卷一·坊都。
- ④康熙《新城县志》卷二·建置志·坊都。
- ⑤鲁九皋，《鲁山木先生文集》，《中田保甲图说》。
- ⑥鲁九皋，《山木居士外集》，《河南永宁知县鲁在田墓志铭》。
- ⑦明赵日崇撰，清杨希闵校刊，《江西新城保甲图册》上卷，《十九都论》。
- ⑧康熙《新城县志》卷二·建置志·坊都。
- ⑨同治《新城县志》卷二·建置志。
- ⑩五人分别为鲁论（1621 年前后在世，字孔壁，号西麓。明天启元年（1621 年）以选贡任安徽颖州府同知，后迁任福建海防同知、福州府同知等。）、鲁训（为鲁论弟）、鲁毓圣（1616—1692 字孕文，号澹庵，康熙岁贡，任丰城训导）鲁启圣（为鲁毓圣之弟）、鲁瑗（1662 年前后在世，字建玉，号留耕，又称西村先生。康熙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历任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讲，太常寺少卿，通政司通使等职，并曾主教于豫章书院。）
- ⑪吴宗慈，《民国江西通志稿·氏族略》。
- ⑫鲁九皋，《山木居士文集》，《仲正公家庙碑》、《中溪鲁氏四修宗谱序》。
- ⑬同治《新城县志》卷十·人物志·善士。
- ⑭详见袁海燕，《清代江西义仓与社会变迁——以新城县为例》，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⑮涂南池，《南池类稿》，《陈凝斋先生墓志铭》。
- ⑯陈以升，字西岐，因对清初“士习浮嚣，结社连朋，豪宕自贵”不满，而“独结茅山间，间修笃行”。由于沉醉于钻研经学，“不治生产”，以致先世留下的产业逐渐耗空，家道也因此衰弱。（同治《新城县志》卷十·人物志·先正）
- ⑰陈世爵之孙陈守中参与乾隆年间南昌大型水利工程豫章沟的改造修筑，共费银一万四千余两。（同治《南昌府志·卷三·府城水利》）
- ⑱吴宗慈，《民国江西通志稿·氏族略》。
- ⑲陈道，《陈凝斋先生文集》，《家训》。
- ⑳详见袁海燕，《清代江西义仓与社会变迁——以新城县为例》
- ㉑同治《新城县志》卷三·仓储。
- ㉒同治《新城县志》卷三·仓储。
- ㉓同治《新城县志》卷三·仓储。
- ㉔江西省水利厅水利志总编辑室编，《江西历代水旱灾害辑录》。
- 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初粤闽湘赣抢米遏余史料》，载《历史档案》1996 年 4 期
- ㉖陈道，《凝斋先生遗集》，《显考立轩府君行状》。
- ㉗鲁九皋，《山木居士外集》，《广仁庄条规》。
- ㉘鲁九皋，《山木居士外集》，《广仁庄条规》。
- ㉙同治《新城县志》卷十·人物志。
- ㉚同治《新城县志》卷三·仓储。
- ㉛同治《赣州府志》卷七十一·艺文，王泉之，《虔州钟氏义田记》。
- ㉜鲁九皋，《山木居士外集》，《广仁庄崇祀议》。
- ㉝鲁九皋，《鲁山木先生文集》，《寄韩理堂书》。
- ㉞鲁九皋，《山木居士外集》，《广仁庄条规》。（以下未注明出处者，皆出自于此。）
- ㉟同治《新城县志》卷三·仓储。
- ㊱同治《新城县志》卷三·仓储，陈守诒，《叙陈氏义仓总簿》。
- ㊲同治《新城县志》卷三·仓储，陈守诒，《叙陈氏义仓总簿》。
- ㊳陈用光，《太乙舟文集》，《九仓斂散籍序跋》。
- ㊴同治《新城县志》卷三·仓储，陈守诒，《叙陈氏义仓总簿》。
- ㊵陈用光，《太乙舟文集》，《九仓斂散籍序跋》。
- ㊶同治《新城县志》卷三·仓储，陈守诒，《叙陈氏义仓总簿》。
- ㊷同治《新城县志》卷三·仓储，陈守诒，《叙陈氏义仓总簿》。
- ㊸陈用光，《太乙舟文集》，《与伯芝书》。
- ㊹陈用光，《太乙舟文集》，《与伯芝书》。
- ㊺陈用光，《太乙舟文集》，《与伯芝书》。
- ㊻（美）王国斌著，李伯重等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p119—120。